

内部资料 注意保管

# 东亚经纬

2016年第1期

## 【本期要目】

◆观察与思考.....	1
从“东洋”到“东亚”（王勇）.....	1
东亚文化环流史：中国文化走出去之东亚经验与教训（陈小法）.....	6
金正恩时代“绑架问题”的有限进展与朝日关系的短暂松动 （王海凡）.....	11
韩国雇佣许可制对中国劳务政策的启示（尹虎）.....	13
◆书评.....	16
《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书评 （彭昊雯）.....	16
《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书评（张徐依）.....	20
◆学术动态.....	24
◆征稿启事.....	28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工商大学 东亚研究院

2016年3月31日

## 从“东洋”到“东亚”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王勇

### 前 言

在亚洲东部，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一个互为影响、相辅相成、共建共享的“文化圈”呢？上世纪中叶，日本学者群体最早提出“东亚世界”的概念，试图把国别史研究推进到区域史研究。代表性学者：松本新八郎、西岛定生、堀敏一等。西岛定生于1962年发表的《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6-8世纪的东亚》影响最大。西岛定生的学说，归总起来有以下几个要点：

- (1) 范围框定在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地；
- (2) 以唐代为范本通行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典章制度）；
- (3) 文化认同模式呈“三位一体”特征，即“怀柔”而非奴役、用文化优势来吸引和改造周边民族、以文明的标准而非血统标准。

此后，滨下武志教授着眼于明清时代东亚的经济交流与物质流通，提出“朝贡贸易圈”，对学术界也产生巨大影响。近年，复旦大学韩昇教授推出新书《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其中论述到：“构成东亚世界基本文化基础的要素有哪些呢？西岛定生列出了四大要素，亦即汉字、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实际上，应该再加上教育和技术两个要素。”

把“技术”与“教育”纳入东亚世界的基本要素，并非韩昇教授首创。上世纪80年代，台湾大学高明士教授率先提出补入“科技”；至于“教育”要素，亦是高明士首先倡导并浸淫数十年的研究主题。韩昇改“科技”为“技术”，两者虽不完全等义，但灵感得自高明士的创意甚明。

如上所述，东亚在历史上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思想、宗教密切，形成过一个互为关联的整体。这是我们以“东亚”为视角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前提。

### 一、作为地理概念的“东洋”

如前所说，“East Asia”不是一个科学的地理概念，作为一个区域边界模糊。《汉语大词典》如此解释：“指亚洲东部。通常包括中国、蒙古、朝鲜和日本。”这是现代国际关系学的界定，而且不甚精确，如缺失“韩国”便属败笔。对此有人提出质疑：俄罗斯的远东区域为何不含其中？因此就出现“东北亚”概念。还有人质疑：与中国陆地相连的印度或越南，如何处置？

可以说，就这个区域从未有过统一的、持久的、公认的名称。比较接近的大概是“东洋”。然而，从“洋”字可以推断，此词来源于对海洋的认知，与“西洋”对应成双，对陆地不太关注。如明代张燮《东西洋考》，列入“东洋考”者7国，归入“西洋考”的有15国；所称“东洋”为南海诸国，而日本与红毛等出现在“外纪考”中。

杨士奇等人所撰《明太宗实录》、顾秉谦都等人所修《明神宗实录》以及《明史》等，“东洋”所涵盖的地理范围逐渐扩大，除了《东西洋考》所指南洋诸国，日本与朝鲜也囊括其中。到了清朝以降，日本作为区域大国的形象凸显出来，因其地处大海之东，且“洋化（西化）”程度颇高，与传统的东方渐行渐远，中国遂以“东洋”专称之。清末及民国时期，凡言“东洋人”、“东洋货”之类均指称日本，并不包含中国自身在内。津田左右吉《東洋文化とは何か》（《シナ思想と日本》，岩波书店，1938）说：“对支那人而言，东洋意味着番人，幕末的日本人却把东洋转换为以支那为主的地域之称。”综上所述，中国人说“东洋”，一般不包括自身，狭义专指日本；日本人说“东洋”，主要称呼中国，广义涵盖亚洲，唯独不包括自身。

## 二、作为文化概念的“东洋”

自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登陆日本，继而荷兰人、英国人等接踵而至，除了基督教之外，他们主要向日本传输兵器制造、天文地理、航海造船、医学博物等知识。

其结果，在日本催生“西洋”的地理概念，而其内涵则包括宗教与技术两个层面。对前者，日本不屑一顾，为此后的“禁教”埋下伏笔；对后者，日本积极汲取，先后出现“蛮学”、“兰学”、“西学”等。

18世纪初，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1713）、《西洋纪闻》（1715），具有标志性意义。新井白石在《西洋纪闻》中，提出将西洋与东洋的特质分为科学技术（西洋）与伦理道德（东洋）的思考模式，此后“东洋”作为抗衡“西洋”的概念，在幕末迅速普及开来。19世纪中叶，佐久间象山（1811-1864）在《省誓录》写下的一段论说，成为传世名言：

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因以泽民物，报国恩。由此可知，从18世纪初期开始至19世纪中叶，在日本语境中已经区分出世界的“东洋”和“西洋”两大文化圈；作为文化区域的“东洋”，中国是其核心，包括与“西洋”文化异质的印度、日本、朝鲜等，但似乎不含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南亚。

明治维新（1868）成功以后，由幕末志士福泽渝吉等倡导的“脱亚入欧”思想迅速发酵膨胀，日本把自身定位在“不东不西”或“东西兼有”的层次，刻意与传统的“东洋”诸国拉开距离，于是言“东洋”时往往剔除日本。

井上哲次郎（1855-1944）于明治十四年（1881）自东大毕业，在文部官编辑局编纂《东洋哲学史》，旋任东大古典讲习科副教授挂，负责讲授“东洋哲学史”，这是日本大学中首次出现以“东洋”为“西洋”的对语，指涉以中国、印度为主的学问。

井上提倡的“东洋哲学”，成为一时风气，影响到其他学科领域，比较典型的是史学界。1894年，那珂通世（1851-1908）、三宅未吉（1860-1929）等人建议在中学设置“东洋史”教程，其内涵则脱胎于中国史。比如，1897年市村赞次郎（1864-1947）将5年前刊行的《支那史》，改编为《东洋史要》；再如，1910年帝国大学将“支那史学”改称为“东洋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现在日本各大学设置的“东洋史”学科不含日本史，源头则在明治年间。

### 三、作为政治概念的“东亚”

“东亚”取代“东洋”而成主流概念，大概肇始于上世纪20年代，时当日本大正与昭和交替之际。在“东亚”概念诞生之初，尚留存“东洋”的文化意蕴，此后随着日本国家性质的变化，逐渐演变为一个政治军事色彩颇浓的概念。

明治十一年（1878），美国美术史家Erne Francisco Fcnollosa（1853-1908）应东大邀请访日，考察日本各地史迹后撰写了一系列论文，1921年结集为《东亚美术史纲》在日本出版。该书英文原题是The Epoch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译者有贺长峰等人因为考虑到全书涵盖了整个东方美术史，故以“东亚”冠之于书名。

这里的“东亚”虽然有可能脱胎于“东洋”，但已经注入了新的意蕴，最重要的是包括了日本，不仅如此，日本在其中据核心地位——至少与中国并驾齐驱。日本重新回到了东方，而且是以主人翁的姿态登场的。

考古学家滨田耕作（1881-1938）在昭和五年（1930）刊行的《东亚文明的黎明》一书的序文中云：“自古以来，中国和东方毗邻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在天然地形上形成一个亲密的文化团体”。此段历史应无需赘言，我所真正关心的是这个东亚文明

究竟如何产生?文化又是透过怎样的途径而波及这个团体的各个个体?于何时发生?……等等问题。因此,我试图由考古学出发,极其概略地叙述以中国为主,涵盖朝鲜、日本之“东亚”文明的缘由。

上述基于文化概念的“东亚”的温馨,可谓好景不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引爆中日全面战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波及南亚。此后“东亚”脱胎换骨为一个政治性的地域概念。平野义太郎(1897-1980)在《大アジア主義の歴史の基礎》(河出书房,1945)中阐述如下:

日、满、华的东亚,包含南洋的大东亚,进而包含印度的东方诸民族,共同集聚团结起来,驱逐美、英对东方的侵略,形成一体的大亚洲。其根基是什么呢?由于日本体现了三千年东方文化的精髓,并且在支那、印度大陆文明和太平洋(包括作为次海洋的印度洋“南海”)海洋文化的中心点土建邦立国;近世时又摄取了西方文化与科学,融合了东西方文化,成了东方的主要势力。所以,日本有绝对的资格为将来东方文化的融合一体预作准备。

作为政治地缘概念的“东亚”,日本俨然占据核心,自以为一方面继承了“东洋道德”之精髓,另一方面汲取了“西洋艺术”之精华,因而理所当然充当对抗“西方”之“东亚”霸主。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对亚洲各国而言,“东亚”背负着沉痛的记忆,给人以极其负面的意象,所以渐渐成为一个“死语”。

#### 四、作为研究坐标的“东亚”

我们在前面提到,进入新世纪以后,“东亚”一词又开始亮相,不仅作为政治地缘概念,而且广泛运用于历史、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当我们将其作为学术概念使用时,必须注入符合现实、因地制宜、面向未来的新意蕴。

(1)从时间上看,“东亚”的地理外延并非固定不变,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时而扩展时而敛缩。翻看复旦大学史地所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册》即可知,中国本身的疆域处于伸缩之中,中国国内的行政区划也变迁不定,更何况包含多个民族、多个国家、多种文化的“东亚”呢?

(2)从空间上看,“东亚文化圈”不是一个平面,而呈凹凸起伏、参差不齐的立体状。以唐代为例,唐诗流行于敦煌、朝鲜、日本、安南,但中国境内的吐蕃、南诏却犹如低洼地。因此我们不能以近代的民族国家、目前的国家区域来界定之。

(3)“东亚”的文明内涵并非凝固单一,在生生不息的区域交流中,既有吸纳也有辐

射。比如儒教传播圈、佛教传播圈、道教传播圈绝不会完全重叠，呈同心等圆形；即使是儒教，孔子与孟子的学说传播范围也大相径庭。时间上的继承、积淀与空间上的传播、影响，构成一个动态的坐标——这就是我们把握“东亚文化”的依据。

以“东亚”为坐标研究“东亚文化”，窃以为其要点有二：一是以中国为基点，追踪中国文化之传播和影响，彰显华夏文明的世界意义；二是以域外为起点，考察对中国文化之摄取与模仿及创新与回馈的机制，拓展“汉文化”的文明内涵。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东亚学”的表里。

## 结 语

2010年9月23日，香港大学举办“East Asian Studie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学术研讨会，以庆祝北京大学严绍盪教授70华诞。香港大学美裔教授Louis Edwards在发言中指出：时下亚洲研究正成为热门，严绍盪教授的丰硕学术成就让我们确信，“亚学Asianology”绝不会是低于“西学”的学问，方兴未艾的“亚流”完全能成为主流。

这位博学的Edwards女士，不仅深谙“亚”字之汉语古义，而且了解西方主流学界的偏见，因而说出这段发人深省的话语。

2013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着手编辑、在北京大学杀青完稿的3卷本“东亚坐标”书系（《东亚坐标中的跨国人物研究》、《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跨国研究》），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发行。我在《总序》中百感交集写下如下一段话：

2008年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两个学期，在东亚系开设了“The book’s exchange in East asia”研究生课程，期间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国际学术研讨会“Commonality and Regionality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East Asia”，并先后应邀到哈佛大学、罗格斯大学演讲。如果说我的学术成果受到西方主流学者的某些认同，我想那是因为我站立在东亚的土地上研究“东亚”，我是当事人，不是旁观者。作为当事人的东亚人的“东亚”研究，理当不同于作为旁观者的西方人的“东亚”研究，无论是方法还是内容，我们有我们的理路、我们的课题、我们的企盼。

# 东亚文化环流史：中国文化走出去之东亚经验与教训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陈小法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新一轮“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号角正式吹响。

之所以称之为“新一轮”号角，是因为早在千年之前，中国文化早就浩浩荡荡走出国门，它不仅走进了邻国百姓生活，也走上了友邦上层社会。当然，它的主要受众面是东亚地区。东亚，既是一个区域概念，也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概念。

一般而言，东亚文化圈主要涵盖了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别范围。古代的中国，由于处于文化高势，在东亚文化圈的中心和周边关系中，往往位于主导地位。这一点从迄今为止学界的研究成果和动向亦可得到充分佐证。无论是中、日、韩、越哪一国，这方面的成果俯拾皆是，无需赘言。然文化的交流，总是主流邀支河偕在，狂澜卷潜潮齐发，顺势携逆流同栖，也即文化交流是双向抑或多向，我们暂且用“环流”来概括之，东亚文化交流又何尝不是如此！

## 一、国内外东亚区域研究趋向

随着中国的再度崛起，东亚研究渐趋热门，相关的研究机构也应运而生，数量逐年攀升。如美国有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等；英国有剑桥大学设有东亚研究所、牛津大学设有东亚研究系等；日本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九州大学东亚环境研究机构等；韩国有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等；新加坡国立大学设有东亚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机构大都凭借地域优势、研究特长而发展自己的特色研究。但我们可以发现，欧美的东亚研究主要是旁观者的“他者研究”，日韩的东亚研究主要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自我研究”。而国内情况与国外略有不同，全国设有日、韩、越南别研究的机构数不胜数，但往往偏重单一学科，缺乏整体性，而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东亚研究大多是排除自我的“无源研究”。

而具体回望国内外东亚研究的成果，不乏独具匠心之作。如欧美早前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及“东方水利社会”，日本曾倡导的“大东亚共荣圈”及韩国率先倡议的“东亚共同体”等，但都因以自我为中心、过分考量自己的利益而难以久远，甚至沦为历史污点和学界诟病。鉴于此，历史的命运自然落在了中国人的身上，也即中国不能够复兴“亚洲价值观”甚至是“中国模式”，成为一个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聚焦

今日，每年出版的东亚研究书籍、论文，召开的东亚问题会议不胜枚举，但这些成果往往过分囿于地区、学科、现实利益的框线，对于解决错综复杂的东亚问题只是触及到了冰山一角，甚至不乏盲人摸象之作。我们说，东亚诸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归根结底大都在于文化的差异和认同。因此，打破学科壁垒、国界限制、利益趋求，整合优化国内外研究力量，取长补短，规避各自为政、重复研究和低水准竞争，以新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重大需求为导向，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已显得尤为需要。

## 二、研究意义

### （一）可资借鉴的千年经验与教训

中国文化走向东亚诸国和地区，少说也有千年的历史。这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如我国的史学、经学、文学、科学、教育、政治制度、文人外交等，给周边国家十分巨大的影响，加速了他们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程。这些优秀的文化，在其传承过程中，受多民族保护，且载体灵活，兼容并包，往往具有很长的生命力。反之则不然，如自大闭关的思想、内外有别的“华夷体系”、宦官及其绕小脚之类的糟粕等，都给我们带来了深刻教训甚至沉重代价。厚重的历史文化往往是把双刃剑。我们说，在政治方面，一般谁占有先机谁就比较有利。但在精神方面，尤其是尊重原创性的领域，鲜明模式的存在只能说是一种阻碍和压力。东亚多国出现的“小中华思想”甚至“华夷变态”思潮，可谓是对上述模式的一种反动。常言“研究多远的历史，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因此，认真总结中国文化走出去之东亚经验与教训，能为新一轮“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千年的珍贵参照。

### （二）东亚世界拥有共同的文化基础

历史再三证明，悦服人众，不依武力，乃是文化。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持续惠及周边诸国，约在隋唐时期形成东亚文化圈，以汉字为媒介的儒释二教、典章制度、科学技术乃至文物器皿、风俗习惯等，辐射融合至周边各国，营造出一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和谐汉文化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共同的文化基础。时至今日，东亚各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充满敬意。因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构面向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传统文化是个不可替代的历史基础，有必要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之力度。

### （三）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已是学界共识

在学术研究领域，从传统的国别研究（点），过渡到比较研究或交流研究（线），再发展到区域研究（面），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大势。纵观欧美诸国的名校与科研机构，多将东亚视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设立诸如东亚系、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院等。



再看周边国家，日本学者最早提出“东亚册封体系”、“东亚贸易圈”等学术概念，2008年关西大学首创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东亚文化交涉学”国家基地；韩国方面也急起直追，冠名“东亚”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其代表者为2009年韩裔财团出巨资在日本创立的“One Asia Foundation”，迄今已在16个国家和地区的106所大学设立“亚洲一体化”讲座。因此，将东亚诸国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已是大势所趋，是与世界接轨对话的必然途径。

#### （四）基于文化环流研究的“东亚学”

近些年来，“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在我国逐渐兴起。在此过程中，由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主导的“欧洲学”，由浙江师范大学开拓的“非洲学”，可谓独辟蹊径，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交叉学科。目前，整合东亚研究的积淀与资源，以东亚地区共享的文化为基础，创建“东亚学”新学科也应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因为（1）中国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与丰富的知识储备；（2）海外在该领域尚无重要建树，我们要先行确立中国范式，引领国际学术发展潮流；（3）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理论创新价值。

### 三、研究内容

东亚文化环流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得失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宝贵经验与教训。具体可分为：

第一：往来人物。文化的交流总是伴随人物往来，尤其在古代交通不便、通讯手段有限的情形下，人物移动给文化的交流是最直接有效的。人物往来粗可分为移民、使节、商人、战俘、外国官员、宗教巡礼者、留学人员等。因此，可根据各群体的特点，研究他们在东亚文化环流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二：汉字读物。文字的传播一定伴随文明的流动，汉字也如此，它起初往往是以启蒙读物作为载体传播至各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将人类历史的演进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而以文字之发明，作为划分野蛮与文明的界限。日、韩、越的文字，既然都来自中国，那么，也就是中国把他们从野蛮带进了文明的历史。当然，日、韩、越又根据国情创制了不少汉字、词汇，而它们又回流到汉字的发源地，传播至其他国家，使得所有汉字成为了汉字圈共同的财产。此部分可重点编辑中、日、韩、越甚至新加坡各国使用的汉字大全，研究各种汉字的区别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今后趋势。为联合国申请汉字的世界记忆遗产工作打下基础。

第三：汉文典籍。正因为是有了汉字的先驱传播，才使得中国与东亚诸国的汉文典籍交流成为可能并肩负更大的使命。从东亚文化交流模式来看，典籍交流是对人物

往来的最有效补充，其影响可以超越时空。这也是古代东亚文化交流区别于世界其它地区的特有模式之一。典籍交流的表面层次是进出口、翻刻等，深层次的是校注、讲读，而最高层次就是开启心智后的创作。因典籍交流而带来的文化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抽丝剥茧将是本部分的研究方法之一。

第四：宗教思想。东亚诸国得益于汉字和书籍的传播，曾经在很长时间共读一样的启蒙书，吟诵同样的唐诗宋词，洗礼类似的宗教信仰，感动着同一文学作品。因此，东亚思想环流的研究，是析出东亚区域文明特色不可或缺的手段。

第五：典章制度。广义地说，它包括我国的法律制度、科举制度、政治制度、货币制度等，它们对东亚诸国的影响完全不可小觑。仅举年号一例来说明。年号，日本自孝德天皇建元大化，至今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一直没有间断。越南自丁部领首建年号太平，直至亡于法国九百年间。韩国比较特殊，历朝皆奉中国年号，直至甲午战争结束，才自建年号。因此，研究这些制度在东亚诸国的不同命运，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区域经验与教训。

第六：史学春秋。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史学要算最辉煌的一部分。中国的史官制度，给各国树立了楷模；中国富有变化的史体，启示了各国史学多方面发展的途径。《春秋》褒贬劝诫的笔法，鼓励了各国史家追求历史的“善”更有过于追求历史的“真”。《春秋》别内外的精神，唤起了各民族的自觉，也刺激了各国的进步。尽管如此，各国还是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政体，亦有各国独自の史学名著。因此，厘清东亚各国史学的异同，是研究该地区文化环流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七：科学技术。包括医学、历学、农学以及中国的四大发明等。科技是重要生产力，中国古代领先的科技，曾迅速改变了东亚诸国的文明景观。当然，正如日、越的火器技术对中国火器的发展提供了不少新贡献一样，相互影响，共同提高，总是东亚文化环流的不二法门。

第八：民风习俗。民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渐趋而成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文化，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东亚诸国的众多民俗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通过研究民俗文化的中心与周缘的变化过程，是解密东亚文化环流的重要一环。

第九：文物艺术。文物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东亚诸国的国宝抑或重要文物名录中，中国众多文物榜上有名，反之亦然。而艺术所具有的魅力，足以改造人们的心灵。虽然东亚文物艺术大多可在中国找出源头，但别国留存而我散佚、灭绝的不在少数。因此，如何对待这些中国文化的“海外游子”甚至“孤儿”，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这些文物艺术的历史与传承，是开启东亚文化环流大门的钥匙之一。

第十：人文外交。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传统中最为珍贵的元素之一。近年来我国的外交实践表明，人文外交已经成为我国外交工作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2013年10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我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理念。这些理念，集中体现了我国文人外交的精辟内涵。然而，环顾东亚地区抑或周边国际环境，中国正面临一些严峻挑战，当前东亚地区中以中日矛盾为凸显点、周边外交中以南海问题为聚焦点，多方势力正在进行冲撞和摩擦。很多问题，用共同外交、政府外交等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手段难以打开困境。因此，深入挖掘具有厚重积累的中国人文外交的历史经验，破解当前周边外交工作中的难点、焦点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文外交的重点在沟通活动，它通常包含三个层面的交流，即人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因此，它理应成为东亚文化环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四、研究提点

首先，要具备全球视野，规避闭门造车。梁启超先生曾分中国史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时期，而以秦之统一至清乾隆末年为亚洲之中国时期。这两千年间，中国民族是中国历史舞台的主角，同时也是亚洲历史舞台的主角，期间中国给与亚洲各国的影响极其复杂。尤其日、韩、越各国，由于地理上毗连中国，吸收中国文化特别积极。因此，本选题的研究要集聚中、日、韩、越等国的有识人士，对同一主题展开纵横比较研究，以求结论客观信服。

其次，中国文明是唯一一个能幸免于难而绵长于今世的文明，其主要原因得益于民族文化之厚基，前代国人之拼死抵抗。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要避免文化虚无主义思想，保持自信和自爱之心，以中国文化为本源，开展与“旁观者”有区别的“亲历者研究”。

第三，坚持“文化出口而非产品出口”“文化融合而非文化侵略”之原则。

#### 五、研究目标

本课题以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之东亚经验与教训为使命，力求达到以下两个目标：

第一：厘清千年古代中国文化流播东亚诸国的历史脉络。

第二：为新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千年的经验与教训。

# 金正恩时代“绑架问题”的有限进展 与朝日关系的短暂松动

天津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王海凡

金正恩执政后所实施的第二次“光明星3号”卫星发射及第三次核试验，使朝鲜的周边外交状况进一步恶化。为缓解持续恶化的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朝鲜不得不在其多次强调已经解决并坚决反对纠缠的“绑架问题”上有所让步，以寻求朝日关系的缓和，进而推动周边外交困境的缓解。最终，朝鲜以成立高级别“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方式重新启动了对“绑架问题”的全面调查，而日本则解除了部分对朝鲜的单边制裁，两国关系也随之出现了短暂的松动。但在实际上，朝日关系松动对朝鲜周边外交的影响也并未起到如其所期望的那样的作用，其对朝鲜周边外交的影响极为有限。

金正日逝世后不久，当时的野田内阁便已经开始积极地同朝鲜进行接触。在2012年1月和3月，朝日两国先后在中国东北和蒙古乌兰巴托就“绑架问题”进行了秘密接触与会谈。其间，朝鲜还释放了两名日本籍嫌疑犯，以借此来向日本传递其欲改善两国关系的善意。而后，朝鲜还通过战时遗留日本人遗骨问题来主动增进与日本的接触与沟通。2012年4月的金日成诞辰百年纪念活动期间，朝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大使宋日昊向到访的日本人士表示朝方可以在收集和返还战时遗留日本人遗骨问题上与日方进行合作。随后的2012年6月，朝鲜向日本媒体开放展示了相关墓地；8月初，围绕归还战时遗留日本人遗骨以及扫墓等问题，朝日红十字会会谈在时隔十年后重新启动；9月初，日本民间团体“全国清律会”成员赴朝鲜咸兴市祭拜当地挖掘出的战时死亡日本人遗骨。朝鲜的一系列积极努力最终获得了日本的回应，朝日两国政府间局长级会谈于2012年11月中旬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尽管此后因朝鲜第二次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双方原定于同年12月初再次进行的局长级会谈被迫推迟。但朝日之间的接触却并没有因为朝鲜发射卫星、进行核试验以及日本国内执政党的更替而中断。安倍晋三再次就任首相之后，其也积极推动同朝鲜在“绑架问题”上的接触。2013年5月中旬和10月，安倍内阁危机管理特别担当顾问饭岛勋先后在朝鲜平壤与中国大连同朝鲜政府高级官员进行了坦率沟通与秘密接触。随着其与中韩两国之间冲突的不断加剧，日本同朝鲜之间的接触也变得更为频繁。

2013年12月和2014年1月，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伊原纯一先后在中国沈阳与越南河内同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高级官员进行了秘密会谈。2014年2月下旬，日

朝双方在中国香港进行了接触，就举行两国红十字会会谈、促成绑架受害者横田惠的父母与横田惠女儿会面、重启两国政府间局长级磋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2014年3月初，朝日两国在中国沈阳举行了红十字会磋商；同月中旬，横田惠（遭绑架日本人）的父母在蒙古乌兰巴托同朝鲜籍外孙女金慧敬进行了会面。这一会面标志着朝鲜在“绑架问题”上的态度有所转变。随后的3月19日，日朝双方在中国沈阳再次进行红十字会会谈；3月末，朝日外务省局长级磋商在中国北京举行，双方就今后继续围绕“绑架问题”进行协商达成了一致。随着朝日双方的积极接触与沟通，两国最终在“绑架问题”上有所进展。2014年5月下旬，朝日两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进行了新一轮的政府间会谈并取得具体成果：双方商定重新调查“绑架问题”，在朝鲜开始有关调查之时，日本将解除部分对朝鲜制裁。2014年7月1日，朝鲜与日本在中国北京进行了外务省局长级政府间磋商，朝鲜向日本通报了关于组建日本人被绑架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的筹备情况，包括该调查委员会的权限、组织构成及负责人情况等内容。随后的7月3日，作为对朝鲜重启“绑架问题”调查的回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决定部分解除对朝鲜的单边制裁。次日，朝鲜正式启动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始重新调查日本人被绑架问题，并将择时正式向日本反馈调查结果。在“绑架问题”上的进展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松动，朝日双方于2014年8月进行了间隔十年后的首次外长会谈。而在此前的2014年6月，日本外相甚至明确表示安倍首相有意访问朝鲜以解决“绑架问题”。但是，在日本部分解除对朝制裁之后，朝鲜却未能按照约定在一年后按时公布日本人被绑架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2015年8月6日再次进行的朝日两国外长会谈中，日本外相敦促朝鲜履行承诺并尽快公布相关调查报告。

尽管，朝日关系因“绑架问题”的进展而出现了短暂缓和，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出现实质性转变。尽管，朝日关系因“绑架问题”的进展而出现了缓和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出现实质性转变。对于朝鲜而言，其在“绑架问题”上的态度转变是为摆脱周边外交困境而不得已为之，其根本目的在于促使日本取消其单方面实行的对朝制裁；而对于日本而言，安倍第二任期内对朝政策的部分调整，其既是为了缓解因其参拜靖国神社和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导致的内外困境，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其自身欲赚取更多政治资本的实际需要。

2016年1月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受制于日美同盟关系、美日韩三边协调机制以及日本在朝鲜核与导弹问题上的立场，日本的对朝鲜政策再次回到了强硬立场，未来一段时间内将难以出现实质性改变与调整。即便今后安倍首相实现了对朝鲜的访问，两国关系再进一步实现突破的可能性仍旧有限。

# 韩国雇佣许可制对中国劳务政策的启示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尹虎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韩国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但由于低生育率、老龄化和就业观念的转变等原因,韩国的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水产业以及农畜业等产业出现了劳动力供应匮乏的现象。其中,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和“3D”(Dirty“脏”、Difficult“累”、Dangerous“险”)企业的劳动力不足尤为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3年10月,金泳三政府开放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实施了“产业研修生制”。2003年7月31日,韩国国会又通过《外籍劳工雇佣等相关法律》,从2004年8月17日正式施行了“雇佣许可制”。“产业研修制”并没有立即取消,而是同“雇佣许可制”平行执行,直至2007年1月1日才正式废止。

2014年雇佣许可制迎来了10周年。为了更好地管理外籍劳工,确保国内劳动力市场的稳定,雇佣许可制实施以来,韩国政府多次对该制度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其中,EPS-TOPIK考试制度(2005年)、诚实劳动者再入国制度(2012年)、外籍劳工招聘信息公开制度(2012年)、外籍劳工退职金出境后领取制度(2014年)等是最具影响的调整。这一过程当中,韩国的外籍劳工政策取得了一定成绩,其政策理论及方针也得到了完善。目前,韩国政府已跟15个国家签订了劳务合作谅解备忘录(MOU)。中国也是韩国劳动政策对象国之一。

冷战后,中韩双边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为两国间劳务合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韩国成为了继日本和新加坡之后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的第三大市场。2011年10月26日,韩国国务总理金滉植在政府中央办公大楼会见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克强,签署了雇佣许可制的MOU,使中韩间的劳务合作关系进一步规范化。据韩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14年8月为止就职于韩国的合法中国劳工数已达248,794人。

由此可见,韩国的外籍劳工政策以及“雇佣许可制”与中国劳务政策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分析和探讨雇佣许可制的劳工权益问题,显然对我国劳务政策制定也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其价值和借鉴意义可以归类为以下4点:

第一,关注中国海外劳工权益。中国海外劳工权益是指我国海外劳工的合法劳动权利和利益,既包括目的地国和我国国内法上规定的权利,也包括国际条约和双边条约赋予我国海外劳工的合法权益。我国的劳务人员在韩国处于“雇佣许可制”的管理和权益保障之下。这一局面又要求我国政府加强对“雇佣许可制”的了解,在此基础上,

通过与韩国政府进行协商，共同加强在韩中国劳工的权益保护。2012年5月16日，我国通过了首部对外劳务合作领域的专门立法即《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为对外劳务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值得关注的是，该条例突出体现了保障中国海外劳工权益的立法意图。只有建立有效的法律平台，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有效保护我国海外劳工的合法权益，才能促进我国劳动力输出的良性循环，建立和谐的涉外劳务输出关系，提高我国涉外劳务输出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形象。毋庸置疑，这一方法也适用于在韩中国劳工权益的保护和中韩劳务合作的发展。加强劳务输出人员的法律教育，在韩国设置维护中国劳工权益的机构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二，向在韩中国企业提供相关劳资关系的指导和建言。对于中国籍跨国公司而言，“劳资关系”是在国外经营企业时最为陌生的领域。在韩中国企业也并不例外，上海双龙韩国工厂罢工事件（2004、2006、2009年）是其典型案例。“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众多中国企业在韩国设立了分支机构或以直接并购、融资的方式在韩国扎下了根。因韩国国内劳动力短缺问题，部分中国企业也在韩雇佣了外籍工人，形成了外籍公司雇佣外籍工人的模式。考虑到外籍劳工权益问题的敏感性，中国各级政府和驻韩大使馆有必要对在韩中国企业进行相关指导和建言，事先防止因劳工权益问题成为韩国人权、宗教团体批评、反对对象的可能性。

第三，谨慎对待当前国内外籍“黑工”问题。近年来，东南亚“黑工”不断涌入用工荒严重的珠三角地区，呈现增长之势。例如，2013年，东莞市查获的外籍“黑工”为400多人，2014年则超过了800人。中山市2014年查处“三非”案件278宗，957人，几乎是2013年的4倍。由于“非法身份”，他们的各种权益很难得到法律保障和社会关心。外籍劳工的“国籍”又很容易发展成为外交问题，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不得不承认，我国保障本国农民工权益的制度与体系尚未成熟。在此背景下，外籍劳工的大量进入，将会使“劳动者权益”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难以把握，最终影响我国劳动市场及经济秩序的稳定。对此现象，我国应提高警惕，一方面严格控制“黑工”流入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应加快完善国内农民工权益的相关制度，为外籍劳工权益问题的处理打下良好基础。

第四，关注韩国外籍劳工政策的经验及教训，早日构思未来我国外籍劳工政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自1995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04年春季以来，一直被认为剩余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出现了“民工荒”现象。我国还处于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阶段，一些招工难的企业选择外籍黑工作为用工资源的补充，导致上述“黑工”问题的主要原因。劳动年龄人口的继续下降，将来会促使我国重新审视劳动政策。为了解决劳工短缺问题，持续发展国内经济，我国今后也有可能制定相关法规引进外籍劳工。韩国外籍劳工政策和雇佣许可

制有着其借鉴的一面，有助于我国当前和未来外籍劳工政策的实施。

关注和分析与中国有着相近的文化，人口年龄结构又相似的韩国外籍劳工政策，使其成为有利于我国劳务政策制定的参考经验及教训，显然具有其独特价值。中国应充分考虑韩国雇佣许可制劳工权益问题的前提下，及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外籍劳工权益的理论体系。



## 书 评

# 《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书评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15 级亚非语言文学 彭昊雯

《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一书讲述的是 19 世纪晚期大清朝与英国之间的“帝国碰撞”，并对“帝国”问题进行了跨文化的历史研究。此书的英文版最早在 2004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 *The Clash of Empires*，直译即《帝国的碰撞》，但正式出版的时候，作者将中文版的书名改为《帝国的话语政治》，因为觉得这个书名更能抓住书的本质。本书以主权想象为中心，着重分析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还有视觉文本中的话语政治，通过处理大量不同种类的文本和历史事件，所有的内容通过与欲望与主权想象相关的帝国的话语政治这条主线串联起来。核心关怀是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以及中国作为古老帝国是如何被帝国的话语政治塑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

本书的第一章的重点是处理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提出了解读现代帝国的方法。作者认为，如果想要读懂现代帝国，就必须将语言、战争、国际法、符号的技术发明以及异域性（foreignness）纳入同一历史进程加以思考。第二章探讨的是“野蛮人”（barbarian）这个概念如何在大英帝国与大清国的军事冲突过程中，获得其极为特殊的跨文化和跨语言的定位。并且，在涉及到“夷”这个字的使用时，中国和外国又是怎样的态度和反应。第三章的重点则是“夷”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在汉语本身的变迁和运用。作者还在此章提出，“夷”是儒家经典主权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而这个主权理论可以在《春秋左传》，尤其是近两千年的经学注疏传统中窥见一斑。第四章里，作者对 19 世纪国际法的翻译和传播进行了详细论述，并着重分析了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及其 1864 年的经典中文译本《万国公法》。通过分析《万国公法》中跨文化的认知方式，以及这一认知在帝国和帝国之间以及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如何流传和互动，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现代主权理念和国际法的理解。由于性别对于 19 世纪的帝国统治不可忽视，作者在第五章里，把焦点转向维多利亚和慈禧太后大致相同和漫长的统治时期，试图给帝国研究提供一个特殊的性别研究角度，旨在发掘一种性别的解读方法，动态地考察 19 世纪的

主权情结如何形成，并如何得到表达。<sup>①</sup>

全书中，个人认为最大的亮点在于作者对于“夷”字的解读。作者在第二章“衍指符号的诞生”中，着重介绍了中英双方在对待“夷”时的不同态度与反应。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郭实腊传教士（Karl Gutzlaff 或 Charles Gutzlaff）关于“夷”字之译所引起的问题。英国人对清朝政府提出“夷”字的抗议可以回溯到 1832 年。这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奉命沿中国海岸向北航行，搜集并汇报有关中国北部沿海开放通商口岸的情报。1832 年 6 月 20 日，阿美士德号（Lord Amherst）在上海海岸抛锚停靠，胡夏米向地方政府官员上禀，要求开放这一地区与其通商。他的翻译官郭实腊传教士在日记中记载了苏松太道吴其泰拒绝了胡夏米的请求，这个过程中，郭实腊 6 月 24 日的日记里有英国方面反对苏松太道使用“夷”这个汉字的记载。日记写道：

我们努力说服所有的朋友不要使用“夷”这个称谓，他的意思是 barbarian（野蛮人）。支那人对所有的外国人都分青红皂白地使用这个词，语气里总是带着狡诈和暗算。到这里来经商的外国人一直忍气吞声，被他们这么称呼，被他们当做 barbarian 来对待。我们抗议这个称谓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向他们指出这个词在中文的书面表达有斥责的含义。打这以后，他们就不再使用这个词了，而是称我们为“外国人”，或者“英国人”。

但是，其中对“夷”的翻译与此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做法不大相同。罗伯特·马礼逊在最早的一部《华英字典》中曾把“夷人”翻译成 foreigner，并与“远人”相提并论（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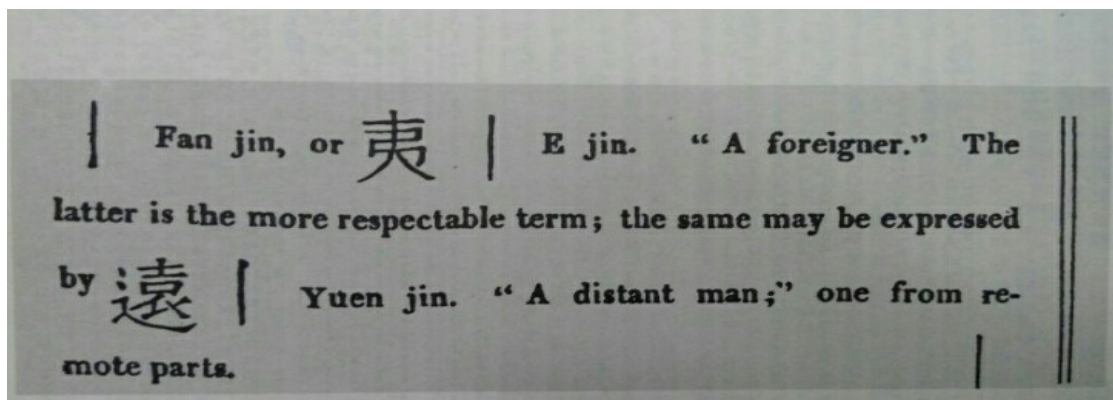


图 1 马礼逊 1815 年在《华英字典》中对汉字“夷”的解释。

<sup>①</sup>《帝国的话语政治 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页 2-6。

<sup>②</sup>Gutzlaff, *Journal of Two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 1832*, 页 233。

东印度公司的工厂档案显示，从 1720 年代末一直到 19 世纪初，公司始终使用 foreigner 来译“夷”。晚到 1831 年，东印度公司翻译同年 5 月 22 日颁布的皇帝圣谕时，还将“夷商”继续译为 foreign merchant。可是，从 1832 年的某一天开始，这个从 18 世纪以来从未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惹是生非的“夷”字，却成了一个大麻烦。之后，郭实腊以翻译官的身份直接参与了起草中英《南京条约》，在《南京条约》谈判的一次会议上，“夷”首次被英方列入条约谈判的议程。“夷”字之辨也随之愈演愈烈。其中，中方吴其泰认为只是用了一个通指外国人的惯用词，不含轻蔑之意，并解释道：“中华自上古圣人该书传世，书内说得很明白：南方谓之蛮，东方谓之夷，北方谓之狄，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自古至今，总是照此称呼。况中华舜与文王都是大圣，孟子尚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岂是坏话？是你多疑了。”<sup>①</sup>

但是，英方胡夏米却认为，被称作“夷”触犯了英国的体面，是一种冒犯、侮辱。此时，中英双方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在对于“夷”进行争辩，其实不然，相对于中方的“夷”，英方实则在对 barbarian 一词反感。Barbarian 一词在欧洲语言中，一些欧洲国家、地区把另外一些欧洲国家和地区的人称作“barbarian”——欧洲人将殖民地的人叫“barbarian”，则是惯例。大英帝国的殖民官员就是带着这种英国既有的“barbarian”的殖民话语来到中国的，他们自然不能接受自己在别人的语言里当“barbarian”的荒谬地位。同时，对于英国人来说，“英夷/English barbarian”证明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蔑视，这种态度与英国人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殖民统治时碰到的经验不符。虽然翻译成中文是“夷”，但是英国人所理解的“夷”是带着“barbarian”的感情色彩，这就牵扯到了跨国翻译的问题。

将“夷”翻译成“barbarian”，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过？这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本书中，作者认为，“夷”字所牵扯到的国面问题是导致鸦片战争的重要导火索。关于这点，有两个问题。一是，英国需要靠对外扩张来丰富本国资本，如果能拿下中国这块肥羊，利是大于弊的。所以，在当初郭实腊翻译“夷”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留下了这一问题，为之后的战争埋好伏笔？看似所谓的国家面子争论是否也是自导自演？二是，在跨国翻译的过程中，本身也存在着问题。由于翻译者对对方国家的文化不是那么熟悉的前提下，犯了这种翻译错误也以为是情有可原吧。只是找对应词却忽视了词语的感情色彩、历史内涵，这样的翻译是不专业的，特别是放到现在的外交翻译，这种错误是不容许的。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如果说是翻译失误，我认为，也是有可能的。

翻阅完整本书，本书的最大创新之处就是作者另辟蹊径，从另外一个层面进行解释了符号学的起源，将符号学和帝国冲突与主权思想的建构系在一起了。作者在前言

---

<sup>①</sup> 《达衷集》，页 51-52。

提到过本书是献给李陀的，而李陀对此书的评价是：“本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别之处，是深究帝国冲突和主权思想的建构与十九世纪符号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深究的同时，还对符号学的起源做了全新的解释，这很重要。”但是此书存在一个不足之处。由于此书最开始是面向外国人，书中大多的参考书籍都是外文书。来自中国的参考文献相比很少。这是否会导致一些观点的不全面？如果中国的参考文献能相对增多，对一些词语的解释和事件的看法或许能更全面些。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在进行论文创作的时候，参考文献方面，如能做到各国文献比例处在一个相对和谐的状态，写出来的东西是否可以更加客观、尊重真相。对于本书的创新与不足，我认为都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此外，本书评中所持见解，仅个人看法，如有不足之处，还请见谅。

#### 12、烂议舟中人即示，则我等告达于朝廷也。/A4-3B

“烂议”一词，汉语未见。“烂”字汉语中有“甚”、“极”之义，表示程度高，或程度深。本文之“烂”，据上下文看，当是“详细”、“深入”之义，“烂议”谓“详细讨论”、“深入研讨”。同卷下文出现“今日虽烂议熟论”（A4-6B）一句，“烂议”与“熟论”连并使用，显然其意思与“熟论”相当。这亦可以印证我们把“烂议”解作“详细讨论”、“深入研讨”为确诂。又，下文安田义方对于太守指出借用朝鲜船只送安田等人回国无先例之事的回答，作“宜烂议于舟中各人而奉复也”（A4-4A），文字与本句基本相同，其中的“烂议”亦同义。

# 《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书评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15 级亚非语言文学 张徐依

2015 年 3 月，吾师陈小法教授专著《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对导师的学术成果自然是不敢妄自尊大的，通读之后感觉该书无论在纵向的时间跨度上还是在横向的空间流向上，都对杭州与日本交流史系统地进行了构架和重组，作为一部地域性历史文化著作，值得向栖居杭城并热爱历史文化的研究者推介。

## 一、《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一书的作者与基本内容

我们知道一部著作的编撰往往与编撰者的研究领域、学术素养和学术经历息息相关。《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一书，作为陈教授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积累而成的一个成果，凝结了其对杭州与日本交流史研究的深刻思考。

陈教授是名土生土长的浙江人，久居杭城，对近似故里的杭州自然眷怀着拳拳赤子之情。作为一名东亚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陈教授专注于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在明代中日关系史、茶道、神道、书道领域的研究成果甚多。其中有《径山文化与中日交流》、《日本书法艺术》、《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等多部代表性著作。

《杭州与日本交流史》是陈教授关注的研究领域，具有研究的学术基础和历史学视野；同时陈教授在 2012 年九月至 2013 年八月期间在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作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员，在资料收集方面有着天然优势。

《杭州与日本交流史》的导言部分分为四节。第一节“从河姆渡经由良渚到跨湖桥”论述了日本民族的起源与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的密切关系。第二节为“《白式文集》与‘杭州’一名的东传”。第三节则研究日语中“杭州”一词读音的演变。第四节介绍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与杭州有关的日语词汇。

正文共分为五章，分别从“隋唐五代”经“两宋”至“元”再到“明”直至“清代、民国”时期，著者沿着历史发展的大体脉络追溯了杭州与日本的交流史。

关于隋唐五代时期，该书着眼点定为“遣唐史”和“吴越模式”。

两宋时期该书分为日本藤原氏全盛期前后的北宋部分和日本武家兴盛时期相对应的南宋部分。经过唐末的战乱，北宋初期的文化暂时衰落，而日本则处于文化极为繁

荣的藤原时代。所以这一阶段日本在佛学研究上的输出倾向尤其突出。杭州，作为江南佛教圣地，充分发挥了其中的作用。该书介绍的人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天台宗僧源信，其《往生要集》入宋；入宋善书寂照，著有《来唐日记》（现已不存）；成寻，为办理入境以及巡礼天台山的相关手续而来杭。杭州的开港，始于北宋。至南宋时，随着商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海外贸易更加繁荣。杭州作为南宋的首都，是东南交通的枢纽。有多名宋商在海外贸易中赚取了巨额财产，谢国明就是其中代表。日本人一般有在大年三十要吃“除夕荞麦面”的习俗，而博多人把这种面称为“幸运荞麦面”，据说这个名称起源于某个荒年，因谢国明慷慨救济受灾的博多市民而来。直到现在，博多每年都会举办千灯明祭，来感谢这位异国富商的恩德。

元代的对外贸易比较灵活，经营有官营和私营之分，杭州当时的主要出口商品为纺织品和漆器。代表性人物有中岩圆月和椿庭海寿等。

杭州自古人文荟萃，寺院众多，加之临近海港，又处于京杭大运河的南方起点，所以在明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当时文艺交流分为诗文唱酬、题写序跋、书画交流。中方参与人员有赴日使节（天逸克勤、赵秩、天竺寺僧一庵一如等）；日方参与人员则主要是具有国家使节和禅林高僧的双重身份的入明僧。众多交流中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的印象西湖。其传播少不了：策彦周良、日本画僧雪舟等杨、五林禅僧万里集九等人。明末清初也是中国文人东渡的高潮期：陈元赞东渡创传了柔术，独立性易东渡广泛进行了痘科类的医疗活动。实际上明代中日关系中的杭州并不全是佳话始终，也曾遭受过倭寇的多次掳掠。因浙江地处海陆要津，加之经济文化发达，历来是对外交流的门户。正因为如此，浙江也成为了易受倭寇骚扰的地区之一。

清代民国时期，该书主要介绍了庭园中的西湖因素，秋瑾、苏曼殊等与日本相关的西湖人物以及日本对杭州的侵略。

## 二、《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一书的学术特色

《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一书的书名准确、直观地言明了该书的主旨。将杭日交流史作为研究客体，难点在于如何把没有明确限定的虚像转化成实体的概念。该书的出彩之处便是对客体对象进行了“立体化全息投影”。以时间为横轴，空间为纵轴，内容为高，将实的史料填入虚的框架之中，相互佐证相互关联。杭州与日本不仅仅是坐标轴上的两个点，是两大有面积的区域板块；链接杭日的交流也非单单的两点一线，其过程的曲折婉转是超越逻辑所构建出的框架的。

在资料搜集方面，《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一书共检索参考有关杭州与日本交流的中日著作 146 部，论文 94 篇，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当然也正因如此，方使该书在资料上具备了深厚的积累。

在思想内涵上，《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一书的前瞻性是不言而喻的。东亚文化圈的交流需要一个广角镜头，套用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名句“幸福的家

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大部分的史学研究都是相似的，不常规的研究各有各的不常规”，来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后所感受到的东亚学理念同样也在《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一书中深有体现：

其一为杭日交流的形态。文明的交流有物质和精神两种属性，物质性交流的典范当属“丝绸之路”，而精神性交流的楷模则为“书籍之路”。正如一颗谷粒可以改变整个文明景观，中日书籍的流通比起遣唐使、遣隋使、入宋僧这些人物媒体是更具有冲击性和影响力的媒介，时髦一点的说“书籍之路”便是文化软实力外泄之路。

其二为文化的波动性。近年来围绕东亚文化的申遗，中日韩间的摩擦不断。其中所牵涉到的文化归属权问题，或许可以用该书中“文化中心流动性”一说加以协调。文化传播是波动的，此起彼伏，有高潮也有低谷。在动态变化之中，如何灵动地转换视角，跳出国别研究、单语种研究这一框架，转化为比较研究、关联研究、区域性研究成为一种时代的需求。

其三新文体史料的挖掘。中日交流中，无论是遣隋使、遣唐使、入元僧再到后来的遣明使，能操一口流利的中文的日僧实属稀少，但是几乎没能阻碍两国的文化交流，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比起会话能力，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中日文人交流，其汉字的识别和运用能力显得更为重要。也就是说，笔谈在那些时代是中日文化交流中常见的手段。

其四为超现实的意象。以日本人的西湖印象为例，《殊域周咨录》（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中关于西湖有如下记载“一株杨柳一株花，原是唐朝卖酒家。惟有吾邦风土异，春深无处不桑麻。昔年曾见画湖图，不意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犹自欠功夫”。西湖之美美于画不假，根据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从13世纪到16世纪日本五山禅僧写的汉文作品中，涉及西湖的达381首。由于交通不便有幸来杭一览西湖美景的日本人为数不多，西湖美学是凭借什么渗透入日本的呢？西湖的自然美景作为实体落入来杭日僧的眼帘，通过日僧丹青妙手之构升华为西湖意象东传日本，又经诗文绘画、书籍传言的“镀金”二次意象化，随后再度被绘之于图，叙之于诗，形之于圆，谱之于曲成为意象下的实体，开始新一轮的传播，因而物理现象并不适用于文化的传播的释义上。波在传播过程中其振幅会逐渐减小，而文化在传播过程却可增可减，从这一层面而言，文化又何尝不是种化学反应，生物变异的过程呢？

### 三、《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一书的学术意义

《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一书的选题立意于对杭州与日本交流史料的汇编与考证，这一选题本身对于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地域性学术意义。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日本在东亚的战略地位下降，那么对日交流方面的研究会因此失去意义吗？答案是否定的。当下是历史测度与未来测度的中心点，研究者的目光不能局限在点上，而应延伸向线，甚至跳跃到面的层次上去。历史的关联有多密切，将来的发

展就会有多长远。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中日的交流总在继续，有东亚文化作为底蕴的交流，越是研究，越有文化的浓度，越有交流的深度，这对于两国文化差异性的理解也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 四、《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一书的不足

《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一书是本中规中矩的学术著作，在趣味性上有所欠缺，且繁多的史料编排给人以堆砌之嫌，在史料的逻辑构架上缺乏创新。陈教授之前在课堂上曾提过应时代所需学术性文章的写作也越来越讲究趣味性。好的学术探究性著作应该如同一部推理小说，悬疑的开篇，引人入胜的环境，环环相扣并一步一步揭秘从而走进真相。该书在内容上的趣味性不少，但编排上平铺直抒波动不大略显苍白，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其次，本书在史料取材上明显得分布不均，明代时期的取材极为丰富详细，相对而言其他时期特别是清代民国时期以及近代的史料有些匮乏，不够完善。史料的选材稍为单一，不够新颖，未能利用起丰富的考古资料，令人实为惋惜。此外对史料的分析还有意犹未尽之感，解读上或许也存在突破的可能性。

#### 五、《杭州与日本交流史》一书的引发的思考

看书中讲述“日本禅”的时候，惊异并深感痛惜的是，中国独立发展出的三个本土佛教宗派之一的“禅宗”，竟是以日语发音“zen”载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而其真正的源流之音“chan”却被拒之门外，随之，“禅”也被误解为日本固有的文化之一，类似的现象还有中国的围棋，在英语里读作“go”，这也是日语发音。

此外，隋唐时期的汉籍经海上书籍之路至岛国流传，成了活的传世品，而在中国却成为了死的出土品。

中国是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没有断层，这是令我们骄傲之处，但是一味满足于形式上的富有，而不注重其内涵的保护和传承，如上所述的“禅宗”“围棋”“失传汉籍”这种精髓文化的不断流失和“改姓”，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文化只有在热爱它的人们手中才能得以传承和发扬。而这便是历史赋予我们年轻一代的使命。



## 学术动态

# “东亚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2015年12月26日-27日，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学报》主办的“东亚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成功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24位专家学者在会议上宣读了论文。会议最后另辟“圆桌论坛：儒学与东亚”专场座谈会，就东亚儒学、朱子学以及儒学在东亚的历史传承及未来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引发了学者的积极响应。

“朱子学”历来有广狭两义，专指朱子本人的思想乃是其狭义，而由朱子门人及后世朱子学者对朱子思想的继承和拓展而形成的朱子学则是其广义。本次会议的主题乃是围绕广义朱子学而展开，包含13世纪传入日本和韩国（朝鲜）之后，经由日韩儒者的再诠释而形成的日本朱子学或韩国朱子学，当然，中国本土的朱子学也是主题之一。

本次会议的论文发表可谓异彩纷呈，或由日本学者讨论韩国朱子学，或由韩国学者讨论日本朱子学，或由台湾学者讨论韩国朱子学，在发表场次的组合上，也故意将来自不同地区的学者进行交错重叠，因而在讨论环节往往出现不同国家或地区出身的学者对同一个问题却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由此发生观念上的碰撞、引起学者的热议。

大会最后进行的“圆桌座谈”由土田健次郎和杨儒宾分别作主题发言，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等六位学者参与综合讨论。土田指出东亚儒学具有“类型共有”与“内容分歧”的特点，儒家传统的“单一天下观”在东亚儒学内部出现了分化，导致“双重天下观”，最终趋向“分化的世界主义”。杨儒宾强调朱子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密切关系，并指出儒学或朱子学如何能做到合理地保留文化民族主义的同时，又要坚信儒学的普遍主义立场，这是一个充满紧迫感和现实感的时代课题。在综合讨论中，朱杰人等对儒学在东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看法，对儒学或朱子学在东亚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不过也有学者担忧对于儒家传统的一元中心论的天下观倘若缺乏反省批判意识，或有可能发展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吴震在总结中指出“东亚儒学”或“东亚朱子学”是一个历史文化学的概念，它既是一种历史传统，又有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因此进一步推进儒学、朱子学乃至东亚儒学的学术研究、加深东亚地区学者的人文交流与思想对话必将有助于我们对未来儒学发展以及建构文化中国等问题的思考。

(信息来源: 社会科学网)

## **第五届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代表大会暨 2016年“浙江与东亚”高端论坛在浙江工商大学召开**

为配合国家“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促进浙江省日本研究总体水平的提升,加快东亚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强化校企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在浙江省社科联的大力支持下,1月9日,由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与浙江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东亚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代表大会暨2016年“浙江与东亚”高端论坛在我校召开。来自浙江各地的学者、我校师生代表参加大会。

会上,浙江省社科联主席蒋承勇教授、社团处黄获副处长分别发言致辞。学会秘书长江静教授做了第四届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工作报告。随后进行了第五届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的换届选举,推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并推举我校东亚研究院的陈小法教授担任第五届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同时聘请我校王勇、王宝平两位教授为名誉会长。之后,陈小法会长代表新一届领导成员,就今后学会的工作思路作了简要发言。

在会后的基调演讲上,我校王勇教授就“一带一路”与中日关系,浙江省外侨办副主任虞希华就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以及我校王宝平教授就浙江与日本研究意义进行了深度剖析。在下午的“浙江与东亚”高端论坛上,来自全省各大高校、政府机关的学者各抒己见,分别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围绕浙江与日本、浙江与东亚的文化互动、经济交往等话题作了主题讲演。

(信息来源: 浙江工商大学网站)

## **聚焦东亚,共话“变化与未来” “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3月12日至13日,第三届“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新西兰及中国的60多位学者,围绕“后冷战时期东亚国际关系与秩序:变化与未来”的主题,立足现实,探讨新时代背景下的东亚发展之道。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东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办。作为世界三大经济板块中最为活跃和最具动力的区域,东亚广受关注,区域

内各方力量变化，格局日趋复杂，地区安全问题凸显，面临新的挑战。

在会上，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杨毅指出，当前世界的许多安全热点都聚集在东亚，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据韩联社3月11日报道，韩国和美国警告朝鲜，若蔑视国际社会继续进行挑衅，将面临“更强有力的”严重回应。另据朝中社12日消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布声明称：“当前的严重事态使人民军全体官兵保持至今的忍耐失去了最后的支撑点。”

杨毅谈到，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进行核试验和利用导弹技术进行卫星发射，使地区形势动荡，但各大战略力量围绕朝核问题采用的不同应对方式，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加剧了紧张局势。前驻英国大使、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马振岗认为，朝核问题牵动东亚局势，但有效化解矛盾需要国际社会的谨慎对待与共同应对。

“亚太有限的稳定性，对生存空间的追求，导致地区内重要大国间的潜在冲突可能性不断扩大。”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古宾认为，除朝鲜半岛、日俄领土争端、南海争议等问题外，东亚也受到越来越多来自中亚、南亚等区域的冲击和安全威胁。多重因素影响区域安全

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受多重因素影响，挑战首先来自地区内部。杨毅分析认为，安倍政权正以“切香肠”的方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严重冲击东北亚安全格局的稳定。日前，据共同社报道，政府不顾民众反对，正为今年3月29日起正式施行《新安保法》进行积极协调，以加速实现自卫队与美军一体化合作。

同时，中国作为东亚的重要力量，崛起既为地区带来发展机遇也使部分邻国产生猜疑与恐惧。中国政法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孙承认为，对于东亚区域内部发生的权力转移，应当谨慎看待，以地区和平安全为重。

外部力量的介入与引导搅动区域安全。清华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周琪指出，美国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让亚太格局日趋复杂。不久前，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金·R·霍姆斯又撰文称，新任美国政府将以“远超奥巴马‘再平衡’或‘转向亚洲政策’的力度”，在东亚大大增加海军部署。

“东亚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合作平台”。尽管东亚地区形势存在变数与风险，但是依然可塑。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石井明认为，地区间各国的伙伴关系相比同盟关系更能保证东亚安全。推动合作共赢的东亚安全格局，关乎地区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韩国东亚和平研究会会长金相淳认为，东北亚各方应需加强沟通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恢复和平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他提出“三阶安全对话进程”，以此推动东亚和平：从中韩“1+1 安全对话”，到中美韩朝“2+2 安全对话”，再以“四方会谈”为基础开展“4+2 安全对话”，最终形成以“六方会谈”的形式综合协商、推进安全发展。

作为东亚区域内的重要一方，中国备受期待。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表示，中国愈加重视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参与，积极提出新的战略和思路。杨毅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通过区域各国经济一体化，促进地区安全关系改善，达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局面。

（信息来源：社会科学网站）

## 《东亚经纬》征稿启事

《东亚经纬》是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面向全国相关机构内部发行的学术季刊。

本刊以研究“东亚学”理论，探讨东亚地区热点问题，分析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走势，传递海内外“东亚学”研究动态及信息为己任，开设“观察与思考”、“名家访谈”、“学术动态”等栏目。

《东亚经纬》不仅是从事东亚研究的各界人士开展学术探讨和交流的平台，也是相关部门了解和认知“东亚学”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渠道之一。

为进一步提高《东亚经纬》信息质量和可读性，能够全面反映“东亚学”研究的现状，兹长期征集相关东亚的研究稿件。征稿要求如下：

- （1）稿件要求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论证严密，语言精炼，资料详实；
- （2）稿件必须由作者（或合作者）完成，杜绝抄袭。字数以 2000—3000 字为宜，优秀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要求；
- （3）稿件中如有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际标准，尽量不用图表；
- （4）一般不使用注释，如有引文，可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出处（按作者、文献名、期刊或出版社、年月顺序）；
- （5）附上作者简介，信息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联系方式等。

本刊收到稿件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阅，并通知作者稿件处理情况。稿件一经采纳，本刊将略付薄酬。

投稿邮箱：youno2014hz@mail.zjgsu.edu.cn

邮寄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 号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邮编：310018）

《东亚经纬》编辑部